

文学史料研究·朱洪涛主持

# 当代文学研究四谈

张 均

**摘要：**对于有志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年轻人来说，在今日量化学术体制下，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怎样在顺应体制的前提下将“稻粱谋”限制在适当范围内并做到“立志须高”。这其实相当不易，而忠诚于自己的“历史记忆点”、于此人间世有所爱憎，其“志”才有可能持久确立，而永不会被外力所熄灭。在“通”“专”关系上，则视野宜宏观，入手宜微观，最后以达于中观研究为佳。选题则应坚持材料优先原则，注重从“不可见”、反差以及矛盾之处打开材料的缺口，以使研究能达“见文”“见人”“见史”之效果。而寻求研究对象“前后左右的关系”，兼顾文学史与学术史双重视野，更是走向学术成熟的必经之途。

**关键词：**历史记忆；宏观；微观；材料优先；双史意识

## 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宋人严羽论诗曾言：“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sup>①</sup>这是就年轻人习诗而言。其实，对于有志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年轻人而言，“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同样是金玉之言。但遗憾的是，在今天学术环境下，“立志须高”，道理虽然朴实、至简，但真要做到其实很不容易。

何以如此？究其缘由，主要在于量化考核的学术管理体制。当然，笔者并不反对量化考核，因为量化考核体制对于弱势学者其实具有保护功能。譬如，假若教授职称晋升没有发表权威刊物论文的硬性规定，而仅以“代表作”定高

下，那些缺乏强大人脉背景的弱势学者的论文、专著势难赢得“优秀”评价，而晋升潜规则大概率会是“背景为王”。而量化考核重视客观数据，讲究硬性规则，能够大幅降低各种非学术因素（如行政权力、门派师承等）对于学术本身的干扰与破坏。对此，学术中人应坦率承认。但是，量化考核之弊亦肉眼可见。对此，各界批评不绝于耳，近年主管部门也要求高校人才评价“破五唯”。所谓“五唯论”，指唯“帽子”、唯学历、唯奖项、唯项目、唯论文之评价体系，但目前来看，“破五唯”的结果是“一唯论”，即唯“帽子”论。即以笔者所在中山大学为例，目前学校内部各

<sup>①</sup>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类人才评定及待遇政策,皆直接与“帽子”挂钩,而基本不再考虑其他学术成绩,如院士对应“卓越学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对应“杰出学者”,青年长江学者对应“优秀学者”,项目、获奖等仅被目为获得“帽子”的条件,而不再作为人才评定的条件。至于最重要的、构成学术本体的有影响力的专著与论文(哪怕是权威期刊论文),则久已不在学校人事部门视野之内。这种情况在全国高校都比较普遍。而且,如此量化考核体制经20余年运作,已形成精密、完善的机制,而经此体制获取成功的学者的加入与维护,更使之稳若磐石,也基本完成对学术共同体的放逐与取代。可以说,今日学术体制非常接近古之“官学”。在此情形下,即便是成名学者,他(她)也不得不经常考量如下问题:为了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是否需要有意地迎合“热点”?为了申报重大项目,是否需要放弃自己最为心爱的研究领域?为了争取权威学者在各类评审中的投票支持,是否需要谨慎地规避自己学术思考中的挑战性与异质性?等等。对于年轻学者而言,这些顾虑就更多了。可以说,当今之世,要做一个干净、纯粹的学者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以学术为志业者,除非甘为狂狷之士,否则,若真要做到“立志须高”,其实相当不易。但是,如立志偏低,误将“帽子”、项目、获奖等当成学术本身,又不免有蹉跎岁月、愧对此生的危险。试想,今日之人反复披读《人间词话》《乡土中国》《谈艺录》《美的历程》,有谁去关注这些论著曾在什么刊物发表,这些作者又曾主持过什么项目?曹丕昔言:“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诤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sup>①</sup>,而“帽子”、项目、奖项等,本质上皆属“飞驰之势”。尤其其评审过程,充满较多非学术因素,更使其学术公信力大打折扣。以此而论,有志于学者,对于量化体制的关系,就不宜于简单地“取”“舍”,而应有更为妥帖、完善的处理办法。在此方面,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的一番话很可参考:

人的自然寿命是有限的,“死生有命”,但学者的学术生命是由自己掌握自己创造的。有些人的写作是为了“稻粱谋”

的,这或是出于一时生活之需,可以理解。但不能老停留在“稻粱谋”的层次,好的学者必有传世意识,这样才会有比较高的自许与文化责任感。<sup>②</sup>

这是吴承学教授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述的观点,是通透、体贴的治学之谈。的确,作为普通人,研究者从事学术工作,也需通过学术成果获得生活保障与社会认可,故在一段时间内或在一定范围内有“稻粱谋”之考虑,也可理解。但是,若长久于此,汲汲于此,沾沾自喜于此,则大可不必。尤其是,即便汲汲于“稻粱谋”,也未必可以获得自认为应该的酬报。当此之时,源自学术本身的“志”,就可给研究者提供心灵的皈依之地。此即钱钟书所言:“世故湏洞,人生艰窘,拂意失志,当息躁忍事,毋矜气好胜;日久论定,是非自分。”<sup>③</sup>所以,“立志须高”也是治学者自我人生完成的必须。只是,在什么时间节点、在怎样的范围摒除“稻粱谋”进而“立志须高”,则因人而异。

那么,当代文学研究者又应当以怎样的“高”为学术标的呢?对此,不同学者的“更高目标”肯定不大一样。吴承学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sup>④</sup>,也言及陈寅恪的经典之论:“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sup>⑤</sup>这种“高”自是超迈古今,却也让人感到不可企及,但若“翻译”成中山大学前校长罗俊院士对

① [梁]萧统编, [唐]李善注:《文选》第六册,第227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 吴承学:《学者要有传世意识与文化责任感》,《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12日。

③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第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④ [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汉书》第九册,第27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⑤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陈寅恪文集之三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于文科学术的期许——“出思想、出理论、出学派”——则又是可亲近、可努力的。后者完全可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者“立志”之所在：所谓“出思想”，是追求能准确、有效捕捉当代文学和当代中国的症结性问题；“出理论”是追求从相关的连续性思考中提炼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自己独特的、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出学派”则是努力以此理论体系和相应实践方法形成持续深耕的学术团队。应该说，如此“出思想、出理论、出学派”，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目前已有成功范例，如程光炜教授主导的中国人民大学“重返八十年代”研究团队，其实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学派”。

当然，这样的“高”，究其根本，其实源出于研究者内心炽热的情感。对此，程光炜称为支撑长期研究的“历史记忆点”。他认为，洪子诚一代学者的“历史记忆点”在于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遭遇，而他自己，则源于他在“大别山腹地的一个知青农场，无书可读，也前途茫茫，达两年多之久”<sup>①</sup>的痛苦。是这种历史记忆，催发了他对干校子弟、对莫言遭际的强烈共情。在撰写《教育——莫言家世之三》时，他情难自禁：

我当时确实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甚至在写作过程中潸然流泪。我心里明白，虽然在写莫言，实际是在写我自己。我与其在为莫言的人生遭遇流泪，同时也在为自己，也包括千百万的同代人流泪。<sup>②</sup>

由此可见，当代文学研究与古典文献学、古文字学等研究不同，它是我们自己时代的文学，是我们同时代人心灵与命运的记录。最优秀的研究者，未必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浩茫感中寻得其“志”，而往往是在为“千百万的同代人流泪”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也锚定自己的学术“基地”。

所以，当代文学研究的“立志须高”，还与研究者自身情感所系紧密相关。J.-P. 迈耶(Jacob Peter Mayer)为《旧制度与大革命》撰写《导言》时，曾引用托克维尔的说法，“成功机会一半以上就在选题”，尤其在于“发现一个能使我自己也为之振奋并为之献身的主题”，<sup>③</sup>在此可谓活生

生的证据。就其他世代学者而言，他们与洪子诚、程光炜之间可能缺乏相同的“故事”，但仍有着自己无法忘却也不可被替代的历史记忆。譬如，事实上已浮游于知识分子群落中的笔者，总觉得自己内心住着一个“乡下人”。当然，并非沈从文那种类型的“乡下人”，而是被近乎原始的体力劳动、被天生低贱的命运所折磨的“农村人”。笔者自幼时，即感受到了城乡等级鸿沟，读本科时又从农村经济研究中注意到工农业“剪刀差”的存在并为之愤然，还耳闻亲见了诸多失败的人生。这些特殊的“历史记忆点”、略嫌混乱的身份认同，也使笔者之“志”并不完全在于当代文学研究本身，甚至也未必“高”，但它却是持久而真实有力的。它使人长久地系怀于仍然生活在土地上的那许许多多的人，以及与他们呼吸与共的某一类型的文学。这一类型文学在今日学术环境中其实已经处于很为不利的位置，但它仍值得被重新认识、解释与“激活”。在2022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一书《后记》中，笔者称“希望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可以与更令自己内心宁静而沉着的研究对象为伴，说出自己能够说出和应该说出的话”，即是此意。

以上云云，不免使人忆及《世说新语》中王戎所叹：“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做当代文学研究，若对百年中国之时世、之个与群的生存，无所爱，甚至亦无所憎，其“研究”就很难找到坚实的立足点。当然，即便是同时代人，其所面对的也并非完全相同的“故事”。但是，无论是系怀故乡的土地，还是面对“先哲将坠之业”，抑或受困于倦怠社会的孤独，当代文学研究者都宜有、敢有自己的“情之所钟”，如此其“志”才能持久确立，而永不会被外力所熄灭。这样，自然更有机会抵达“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sup>④</sup>的境界。此种境界，其实与现实名利关系都不大，而惟关乎我辈的内心，学术也会因此而成其为钱钟书所说的“荒山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

①② 程光炜：《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③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第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④ [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第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量培养之事”<sup>①</sup>。

## 二、宏观、微观与中观

但凡治学,还必须考虑“通”与“专”、宏观与微观之关系。以理想计,当然是“通”“专”兼顾为宜。胡适即持此见,他以为,“学问之道两面而已,一曰广大(博),一曰高深(精),两者须相辅而行。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余失之浅者也,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sup>②</sup>。以他的看法,广博可为专精研究提供宏阔的视野,具体而精的研究可使广博落到实处。然而,这是就原则而论,但就具体选题而言,仍存在从“通”入手或从“专”入手的问题。或因于此,钱穆在治史中明确希望以“博识”驾驭“专攻”,先“通”后“专”:

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sup>③</sup>

胡适、钱穆所言,自是处理允当。然而今之求学者,已与当年情况大有差异。钱穆是学术大家,视其正式教育经历,仅止于私立钟英中学,他的主要求学经历,其实更多是承续家学,研读经史,《四书改错》《马氏文通》《二十二子》等,皆是他青少年时日相揣摩的典籍。粗看起来,钱穆所受正规教育时间较短,但今日接受正式学校教育超过20年的中文系研究生,其学术根底其实很难与钱穆这一代人一较短长。今日学者,其中学时代,除语文外,还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诸科。在中考、高考压力下,越是优秀学生,越是兼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诸科。钱钟书数学15分上清华外文系、吴晗数学0分上清华历史系的佳话,在今天绝无重演的可能。所以,今日通过高考制度走上学术道路的学者,其国学“童子功”与钱穆、钱钟书一代人有天壤

之别。这不是智力与努力程度的差异,而是能够投身于此的精力相差极大。在此情形下,若再求“通”“专”兼顾,或先治通史、再成专家,其实都勉为其难。而要坚持以“通”为上,则更难为。若轻率如此,可能会更多地收获失败。20世纪80年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在当时,“现当代文学因为贴近现实而处于社会生活中心,一部创作或者一篇文章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响,许多‘文化英雄’就此诞生,从事文学工作令人羡慕”<sup>④</sup>。亦因此故,当时批评家蜂起,论题普遍宏大,指点江山,意气飞扬。但四十年过去,这些批评中的绝大多数都已随风而逝。

那么,对于今日学者而言,应寻求怎样的“通”“专”之关系呢?赵园的提倡很可借鉴。她也提倡“通”,但并非去做《国史大纲》这样的“通史”。实际上,她明确反对做大题目,建议年轻人能够抵挡大题目的诱惑:“选题大而无当,有时正由于能力的缺失。没有自己的问题,只能借助于铺张。这里有上个世纪80年代鼓励‘宏观研究’的遗害。大题之外,还有诸种大词儿,动辄‘中国’、‘20世纪’。对研究者,‘大’的诱惑往往难以抗拒;诸种‘基金’以至出版界都有可能鼓励大题。”<sup>⑤</sup>这表明,赵园比较警惕“大题”与宏观研究,那她提倡“通”又是何意呢?其实,主要在于“通”的识断,在于超出纷繁个案的“大视野”,而非宏大题目。她表示,“大视野不意味着做大题目,更不意味着笔下一味嚣张”,相反,她推重“严格限定论述范围,将问题具体化——逼你自己向深处开掘,尝试着‘挖一口深井’”,此即所谓“小题大做”: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学术勇气”中

- 
- ① 郑朝宗:《钱学二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 ② 胡适:《藏晖室札记》,1915年2月3日条,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
  - ③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 ④ 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 ⑤ 赵园:《思想材料文体——治学杂谈之一》,《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包含了无知,其表现如侈谈“传统文化”、“世界文学”。针对上述倾向,有“小题大做”的说法。“大做”着眼在学术含量。我以为这里的“大”,取决于视野,取决于“相关项”、“相关领域”的发现。相关性是赖有发现的。“相关”与否,系于人的识力、视野,并不现成。越深入,相关的知识领域、论述空间越宽广。<sup>①</sup>

这就提出了更贴近今日实际情形的实践路径: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或者说,是以“大视野”为识力,但具体着手则抓紧“小题目”,然而,在做“小题目”的过程中又不能局限于“小”,而要努力见微知著、由一滴水见出整个世界。此即梁启超所言历史学家的责任:“因为眼前问题引出很远的问题,因为小的范围扩张到大的范围……要将注意力集中,要另具只眼,把历史上平常人所不注意的事情,作为发端,追根研究下去,可以引出许多新事实,寻得许多新意义。”<sup>②</sup>这是另一种“通”“专”兼顾、宏观与微观互通的可取的治学路径。

就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如此打通宏观与微观的“小题大做”之法尤见必要。无论是经典文本分析,还是文学史料考证,都最好能由“小”及“大”,能由一个案例见出一个时代文学生产的普遍问题。当然,对此“小题大做”之法,随着“史料派”在当代文学研究(包括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兴起,未必所有学者都表认可。或有学者会以乾嘉遗风为范,认为研究者若能发掘、订正一二史实,即已具备充分价值。这种倾向,在近年一些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论文中颇为明显。但这种有“小”无“大”、有“考据”而无“义理”之研究,其实存在两重误解。一,乾嘉学派之所以走向纯粹训诂考据,有其特定时代因缘,而非学术理当如此。对此,钱穆曾有言及:“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祸,习于积威,遂莫敢谈。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精神意气,一注于古经籍,本非得已,而习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乾、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也。”<sup>③</sup>二,文学研究不是音韵训诂研究,亦非历史研究,甚至,其真正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学文本(尤其经典文本),至于作家

生活史、文学观念史、文学制度史等,如果不是能够有助于对文本生产、时代精神生活的理解,其价值也比较局限。以此而论,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就差距甚大:如果历史研究以发掘事实、考订真相为追求,那么,这一层工作在文学研究中就不那么重要,因为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事实——文本——已呈现在眼前,无须考订,至于文本“周边材料”的考订,究其根本是从属的、工具性的。譬如,家世史料、行踪史料、本事史料等,的确可以丰富、夯实文本之研究,但如果欠缺这些史料,虽有所遗憾,但并不在根本上妨碍研究的进行,此即作者失考的《诗经》等仍可研究、诸多当代评论家完全不做史料工作仍能开展优秀批评的根本原因。就此而言,文学研究若只做史料考证,就多半会止于“外围”研究,若能兼容史料与阐释、能从微观到宏观,才有更多触及文学研究核心的机会。在此意义上,“小题大做”,是兴趣偏于史料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尤其需要注意的。

当然,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而言,真要从微观到宏观也不太容易。这主要因为当代文学研究跨度较小,不如历史研究动辄可追溯数百年前乃至千年以前。譬如,通过《芙蓉镇》自然可以讨论“八十年代文学”的构成,通过《平原上的摩西》亦可深究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语法,但要以之观察千年文脉的演变,就不免吃力。这就是说,就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所谓“小题大做”的“大”,其实未必能够很大。或者说,由其微观未必能抵达真正的宏观,而更多属于中观层面的问题,诸如“八十年代文学”与后社会主义时代文学书写,即属中观层面。即此而言,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小题大做”之法更准确的表述是:由宏观着眼,由微观入手,最后及于中观之观察。

那么,对于年轻求学者而言,如此宏观、微

① 赵园:《思想 材料 文体——治学杂谈之一》,《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8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

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591-5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观、中观之关联又当如何把握呢？其中，作为前提的，其实是宏观视野，尤其是与学科“真问题”相关的视野。譬如，就当代文学学科而言，存在怎样的悬而未决、有待突破的理论问题呢？对此，研究者自可有贴近自身“历史记忆点”的判断。然而，这种判断并不宜于直接构成研究的对象，而更宜于作为选定研究对象的根据。此即“小题大做”中“大”与“小”之关系：是“大”决定了“小”，是特定的理论视野决定了研究者为自己选定怎样的具体的作业领域。这一作业领域，不是学术“游击战”的区域，而是可以深耕十年乃至二十年的“根据地”。当然，对于热点频出的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所谓“根据地”意识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够具备或愿意具备的，但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却是基本常识，姜亮夫称之为“做一桩”：

“做一桩”是指在具备了一定的知识积累，有了较好的知识结构以后，为能进入研究而专攻一个有一定份量的课题或专门研究一部至一组比较重要的著作。姜先生把这种专攻比作“做桩”——在水里钉桩子，桩子钉稳了，以后漂过的东西就会在桩上绕住，越绕越粗。也就是说，做学问有了一块基地，一切都为它服务，这块地上就会结出硕果来。而拿下了一块基地，熟悉了某种经典，以后便能触类旁通。<sup>①</sup>

这实在是高远之志者断断不可疏忽的。实际上，能否及早地、正确地确定一块“根据地”并修炼“做桩”功夫，几乎可以影响到一个人学术生涯最终之成败。故彭玉平教授称，“若立志终生治学，则需早立自家田地”<sup>②</sup>。

由此可见，在治文学史方面，其实古今同理，即强调宏观视野下的“专攻”研究（聚焦式研究）。此种研究路径益处明显：不但材料可以“绕桩”集中，问题亦可相互打通，于研究而言，既可省力，也有利于深入。当然，“专攻”亦自有其问题。此即，随着“学术人口”增加，想找到别人未曾涉足的领域，其实也逐渐发生困难。在“僧多粥少”、内卷严重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这种困难更是随时可见。那么，在此情形下求学者

是否还应坚持“根据地”意识呢？对此，彭玉平称：“自古及今，治学者何止万数，学术富饶之地，或分封或被占，所余者能有几何？然此亦看如何说，若偶得妙题，一力耕耘，亦足惊世。即他人已多开垦之地，或多在地下三尺喧闹不息，若得大力再往下掘地三尺，或真正宝藏原封未动，坐等知音者久矣。”<sup>③</sup>这无疑经验之谈，深可借鉴。

视野宜宏观，入手宜微观，研究则达于中观，这是当代文学研究比较现实的考量。不过，这是否意味着“通”之研究一定不可为呢？不然。至少，就学术自身推进而言，其实永远需要兼具深度与广度的通论。尤其是，每个学科都存在一些制约学科发展的“硬骨头”理论问题。比如，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如何打通两个“三十年”并重建其内在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即是悬而未决之重大问题。研究者如能解决此类问题，其价值自然高于此种或彼种微观研究，其间区别，恰如顾炎武所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sup>④</sup>然而如此“硬骨头”问题，就不是“小题大做”可以解决，它必须“大题大做”。实则在近四十年学界，取得最广泛影响者，恰是李泽厚、秦晖、汪晖等能够“大题大做”的学者。即此而言，年轻求学者在两种情形下依然可以尝试“通”之研究：（1）研究者本人确实深具宏观思想的识见；（2）研究者经过长期“小题大做”后，亦可由约返博，集中思考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此研究，风险诚然升高，但价值也明显更大。

### 三、材料功夫

当然，就绝大多数年轻求学者而言，“小题大做”仍是最为可靠的学术路径。而从“小题”入手，就意味着要在某一“根据地”上细心勘采

① 沈金浩：《“做一桩”和“注一书”——姜亮夫与钱仲联先生治学方法感言》，《昭通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②③ 彭玉平：《倦月楼论话》，《古典文学知识》2017年第1期。

④ [清]顾炎武著，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第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材料。所以,材料功夫,往往就被视为学术研究最重要基础。彭玉平表示:“前人论治学辄言:聪明人下笨工夫。此乃就聪明者而言,若自忖不够聪明,则尚须加多一倍甚至数倍笨工夫。比得笨工夫,方能留得天地供聪明驱遣。徒恃聪明者,吾未见其有真学问也。”<sup>①</sup>这是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其实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有先觉者将从这种“笨工夫”得来的“材料”作为学科进展的重要标志。譬如,在2019年,程光炜如此谈及“十七年文学”传媒、报刊及档案研究:“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材料’开始作为‘史料学’的骨干部分,被人们重视;‘材料’的历史可信度在增加。而在前几年,这种现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经常说,一个学科的兴起,是以‘史料学’为基础的,没有史料学建设,它只被人看作是一个没有学科自律的群体。前些年,学术界对当代文学界的观感不好,认为它乱糟糟的。现在没有这类偏见了,因为一批当代文学史研究成果开始浮出历史地表,我们也觉得,当代文学史研究真的有起色了。”<sup>②</sup>这种判断,或许并不被评论家普遍接受,但对年轻求学者而言,却是深可重视的学科走向。那么,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又当如何理解并践行“聪明人下笨工夫”呢?

(一)材料优先原则。这指的是,研究者在撰写论文、专著以及申报课题时,当以扎实、一手、新鲜的材料作为第一原则。或者说,如果一篇论文、一本专著不依靠丰富扎实的史料也可完成,那么这样的论文和专著最好不写。这样说,并非否定纯粹理论研究的价值,只是就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材料的丰富与新鲜,可以为年轻求学者提供最为可靠的根基。而从笔者自己的阅读经验来看,是日益不太习惯阅读仅以文本为据而对作家口述、回忆、书信、档案等“周边材料”视若无睹的论文。在此意义上,古代文学治学经验值得反复体味:“非有新文献或新观点,勿刻意为文。盖文非一事,关涉多方,若不能自作主张,稍一布置,则左支右绌,难免落入他人窠臼,而不能成自家篇章矣。”<sup>③</sup>不过,若将这其间的“或”字替换为“和”字,会更夯实研究的基础。

当然,强调材料优先,并非以材料为装饰之具,而是关涉如何提出问题的路径问题。在此,

不少人可能会对“视野宜宏观、入手宜微观”一说产生误解,以为问题系从宏观视野中产生,甚至以为所谓“聪明人下笨工夫”仅是尽量为自己激动不已的新观点补充足够多的佐证材料。倘如此想,那就堕入了“悬问题以觅材料”之泥坑。当然,“悬问题以觅材料”中问题的来源,亦分多种情形。有从西方理论中来,如从事文论研究者“基本不读文学作品,他们关注的对象无非是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索绪尔、维特根斯坦、罗兰·巴特、拉康、德里达等……他们孜孜不倦地研读这些本不属于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书,琢磨那些十分陌生的问题,往往从一个陌生问题牵出若干陌生问题,再从这些陌生问题牵出更多的陌生问题,没完没了,永无止境”<sup>④</sup>。也有从自己的理性推断而来,如费孝通所叹息的某些年轻人的研究,“能看出来读了不少书……(他)是先有一个主题,找出象征物作为代表,再从许多书里边找出有关的资料,把资料集合在一起。这样做,当然要看很多书。因为他是为表达一个主题而去看书,所以就很难深入进去。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都是碰一下就回来了,没有深入”<sup>⑤</sup>。无论哪种情形,“悬问题以觅材料”都是问题先行而材料后补。这类研究看起来有观点也有材料,但其论述往往光滑、平顺,缺乏历史本身势所难免的皱褶、摩擦与难以“驯服”之处。换言之,其中可见的,是研究者自己所相信的某种理论,不可见的,则是对象自身内在的问题与逻辑。

显然,材料优先原则与“悬问题以觅材料”大相殊异。以此为参照,“视野宜宏观”即指研究者在择定研究领域、勘定“根据地”时应适当参考一些宏观的重要问题,但这些问题主要是作为参考背景而存在,并不直接构成具体撰写

①③ 彭玉平:《倦月楼论话》,《古典文学知识》2017年第1期。

② 程光炜:《史料的前途》,第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④ 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第44-4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⑤ 张冠生记录整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第2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论文时的问题。那么,具体问题又从哪里来呢?自然源于“入手宜微观”五字。即是说,研究者应该着力发掘材料,进而从材料的阅读、比照中提炼得出具体、切实的问题。这意味着,材料优先于问题,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观点,都理当是新材料的“产出物”。对此,陈寅恪阐之甚明:“夫考证之业,譬诸积薪,后来者居上,自无胶守所见,一成不变之理……但必发见确实之证据,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张,不敢固执,亦不敢轻改,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sup>①</sup>费孝通晚年回忆自己一生的研究,也表示:

我提出来的很多观点,都是从实际当中看出来的。每一个想法,都包括有一段真实的经历,一个故事。

……

不是空想,而是实际地看。看见具体事情,看出来意思,把意思说明白,再回到实际中去。<sup>②</sup>

费孝通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也受结构功能主义等西方人类学方法的影响,但他的研究都是实地调查的结果。《江村经济》《乡土中国》诸作,皆优先考量调查材料,进而从中提炼问题,甚至提炼出新的人类学概念与方法。

如此种种,堪为当代文学研究之范本。当然,文学研究并非人类学研究,亦非历史研究,它可以不依赖文本以外的材料而展开。但是,若欲见人之所未见,多针对文本“周边材料”做些“笨工夫”,实在非常必要。程光炜近年屡屡提倡“做具体的研究”,即是希望当代文学研究能从具体材料中找到有力量的、富于“真实感”的问题。譬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灯记》等经典文本,已被反复“重读”,若无新的材料,颇难打开新的问题空间,但来自涿鹿县温泉屯镇文史爱好者李兆生所著的《丁玲在桑干河上》,来自李玉和原型之一李维民的长篇回忆录《地下烽火》,都为再次“重读”提供了可能。当然,也因材料优先的选题原则,有些研究不得不放弃。比如,作家冯德英曾多次提及小说《苦菜花》系以其母亲、姐姐为原型创作,但皆言之不详,笔者曾为此辗转联系到时在青岛养老的冯先生,

希望面见采访,但冯表示年事已高,不愿意接受采访。2022年,冯先生去世,有关《苦菜花》的核心本事史料也就永成遗憾了。程光炜曾经提及史料研究者“往往因一份材料缺失,接下来的工作就很难开展、继续,被卡在那里不能动弹……往往不得不长夜孤灯,这种孤独、寂寞,类似在茫茫大海上漂流的小舟”<sup>③</sup>。以材料优先,有时确实会遭遇这种情形。

(二)“打开材料的缺口”。这是指所谓“小题大做”如何具体操作,或者说如何以“聪明”升华“笨工夫”。实际上,研究者若坚持材料优先,在“自家田地”兢兢业业,必会积累可观材料。这些材料的获得虽然与某种宏观视野有关,但材料自身往往是鲜活、琐碎、芜杂,仅止于具体而微的事实,若无“大”(至少是中观层面)的问题的照亮,未必能够转变为有效、有力的研究。这就意味着,面对细碎的材料,研究者尤需有历史的识断与理论穿透力。否则,研究就会落入钱穆所批评的“寻其枝叶,较其铢两”<sup>④</sup>的境地:

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途辙,则为考据而考据,其貌则是,其情已非,亦实有可资非难之疵病也。<sup>⑤</sup>

那么,该如何从考据到义理、从“笨工夫”到“邃深之旨义”呢?这就要求研究者有能力打开材料的缺口,从缺口找出“大做”的问题空间。目前来看,至少有三种材料的缺口可以引起注意。

(1)材料矛盾之处。若对材料广为搜集,研究者往往能注意到关于同一事件可能说法不

① 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三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0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② 张冠生记录整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第208—20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③ 程光炜:《当代文学研究:问题和史料》,《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2期。

④⑤ 钱穆:《学钥》,第139页,香港:南天印业公司,1958。

一,材料之间彼此冲突。譬如,路遥及友人在回忆中多提及路遥1971年曾将招工指标让给其初恋、北京知青林虹,但近年林虹本人在某微信群内表示,当年铜川工厂来延川招工,“是要一名普通话较好的播音员。自己当时在县里就做过播音员,因此被录用,而路遥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口音,并不符合招工单位条件,所以,这个招工指标并非他的赠予”<sup>①</sup>。又如,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故事发生地黑龙江省尚志县元宝镇,当地人先后编写了两部村史《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2003)、《从光腚屯到亿元村》(2004),纪录片导演蒋樾、段锦川也于2005年到该村采访当年土改当事人,拍摄完成纪录片《暴风骤雨》,然而对读此纪录片与两部村史,可以发现其所呈现的元宝镇土改面貌存在明显冲突。(2)材料反差之处。较之冲突,材料反差就更多见。譬如,从手稿本到征求意见本到初版本,其文字、段落乃至“副文本”信息可能多有差异,从现实中的原型人物到小说中的艺术人物,其改造、升华之处更是普遍存在。以王安忆撰写《小鲍庄》为例。这篇小说源于她一次前往宿迁采访一位12岁女孩韩余娟的真实经历。该女孩因为在水灾中抢救一位五保户老人而牺牲,王安忆将其事迹写成报告文学《小松树,轻轻地响》,发表于《儿童时代》1984年第8期上,过后又觉得意犹未尽,又另撰成“寻根小说”《小鲍庄》。此即她所言:“我把《儿童时代》让我写的报告文学写完以后,就写了自己的小说《小鲍庄》。”<sup>②</sup>应该说,这位牺牲的小女孩与“寻根”并无关联,但作家以独到眼光对原型予以必要的艺术改造。类似材料反差,在小说与连环画、地方戏曲、电影、电视剧等不同形式之间的跨媒介改编中,同样普遍存在。(3)“不可见”的材料。并非所有真实的过去都会有机会被呈现于众,作家以及当事人有可能有意淡化甚至遗忘某些材料。对此,研究者应特别留意。譬如,作家张炜比较回避自己的家世材料,而回避可能因于过深的隐痛,陈忠实在有关访谈、回忆录中也从未提及他在1972—1973年参与编写的村史《灞河怒潮》,但这部村史所叙对象、历史跨度与《白鹿原》高度相似,内容则是南辕北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白鹿原》有着后来居上的真实优势,因为据一同参与编写的郑征先生回忆,《灞河怒

潮》是以四位作者在郭李村长达3月的入户调查为根据写成,“都是真事,不敢胡说,真是真人真事”<sup>③</sup>。既如此,在陈忠实回忆中变得“不可见”的《灞河怒潮》,就是深可留意的重要材料。

以上“不可见”、反差以及矛盾诸种情形,其实都是可以引起研究者敏感的材料缺口。那么,该以怎样的眼光去打开这些缺口呢?郜元宝曾经以为,文学研究可以在“见文”“见人”“见史”三个维度有所创获,<sup>④</sup>打开材料的缺口,同样可以由此着眼。(1)可以“见文”,即可从材料缺口中见出一篇经典文本或一个时代文学生产的内在机制。譬如,将《小鲍庄》“周边”材料与小说文本进行对读,从其反差中,既可理解王安忆组织叙述的内在机制,也可深入勘察“寻根小说”的发生及内在话语实践。对于各类跨媒介改编的材料反差,也可如此“小题大做”。如此,向“内”深入的文本解读能因“外部”材料的加持而更具历史重量与可信度,原本游动在“周边”的外部材料也因“内”的映照而变成了有意义的材料。(2)可以“见人”。路遥与林虹之间充满争议的“真相”,张炜不愿让人知道的家世,以及传言中存在的张贤亮自传,倘若深究下去,皆可呈现作家特殊的灵魂世界的构成,及其所创造的文学世界。(3)可以“见史”。在当代文学史上,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都是文学运动与重要文学事件的频发时期,其间材料多有记载相左或关键事实缺失之处,若能细勘、辨识,自然可以促成对当代文学史、思想史乃至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深度。

#### 四、“双史”意识

从材料缺口中“见文”“见人”“见史”,可谓以“聪明”而使“笨工夫”焕发神采。不过,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所谓“笨工夫”不仅是“早立

① 程光炜:《路遥和林虹关系的一则新材料》,《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

② 王安忆:《来自经验的写作》,《光明日报》2015年9月10日。

③ 2024年7月21日笔者采访郑征先生录音记录。

④ 郜元宝、李晓晨:《文学研究当“见文”“见史”“见人”》,《文艺报》2023年4月19日。

自家园地”并在其中广泛搜集书信、日记、档案、回忆录、口述等周边材料,而且还表现在事关“双史”意识的资料准备之上。所谓“双史”意识,一是文学史意识,一是学术史意识。对于长期治学的学者而言,这自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但对于年轻求学者而言,却也属于容易疏忽且有时也不易做到的“笨工夫”。

(一)文学史意识。史的意识,乃学术研究之基本要求。对此,顾颉刚说得非常分明:“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sup>①</sup>对如此历史研究方法,胡适则形象地称为“祖孙的方法”:

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sup>②</sup>

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而言,这种寻求“前后左右的关系”的做法同样必须,但这也导致当代文学研究非行内人难以深知的辛苦。其间原因,一在于当代文学处于漫长文学经典序列的尾端,几乎所有重要经典都处于它的“祖”的位置,不能视而不见,二则近五十年来承平日久,作家普遍获得稳定、有充分保障的创作环境,诸如张炜、贾平凹、王安忆、王蒙等作家,都是产量惊人的创作“大户”。一部《全唐诗》,25册,总计2200余诗人的创作总和,大约也只能与贾平凹目前已出版的作品总量相当。至于网络长篇小说,篇幅常有长达千万字以上者,如《医道官途》长达1126万字,《武炼巅峰》长达1834万字,其篇幅之长,已经达到作者本人可能都无精力读完的程度。但是,即便有如此辛苦,当代文学研究却不能放弃寻求其“前后左右的关系”。

那么,年轻求学者该怎样践行如此文学史意识呢?这涉及三层。(1)研究作家作品,要将具体研究对象置放于作家个人创作历程中去观察。在新时期崛起的当代作家,创作历程往往已达40年以上,故研究其一作品,必须“瞻前顾后”(胡乔木语),如研究王安忆《长恨歌》,就须

联系此前的《69届初中生》《流逝》以及此后的《富萍》,观察作家呈现“上海”时所采用的故事策略与叙述机制的差异,才能更充分地打开有价值的问题空间。(2)还要将研究置放于当代文学史乃至百年文学史脉络中去“揉搓”。古代文学研究目此为“比较”,“比较之观念应予强化,无比较,即无所谓特性……如研究欧阳修散文,便不可只在一部欧阳修文集中做道场,要前看韩愈,后看苏轼,才知欧阳修究竟身处何地”<sup>③</sup>。当代文学研究同样需要把“道场”做大,如考察《平凡的世界》,就不能只在《路遥文集》中做道场,而要前看《创业史》,后看《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与《山海情》,才能深解此作在左翼—社会主义文艺传统“起承转合”中的特殊位置。(3)若有可能,还需要将当代作家作品置放于古今文学演变或中西文学互鉴的脉络中予以考察。诸如莫言的《檀香刑》与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没有此种古今中外的文学史视野,势难呈现作家对古典资源的化用,及其对于西方现代个人主义内面书写的重新调适。

如此种种,其实都是寻求其“前后左右的关系”,是既要“瞻前顾后”,也要“左顾右盼”。其所顾盼者,甚至不仅是与研究对象形成互文关系的文学经典,其实也包括研究对象所置身的历史语境。故当代文学研究之文学史意识,固然主要是指理论视野,但其根基却在相当繁多的“笨工夫”。如果不对张炜、王安忆、王蒙等作家的漫长创作如数家珍,很难去研究他们的某一名篇,如果不熟读“三言两拍”等,也很难讨论贾平凹、格非,如果不热爱博尔赫斯,大概同样无从谈论《夜晚的潜水艇》这样想象诡异、迷幻的小说。所以,对于年轻学者而言,读书,大量地读书,恐怕是永不过时的需要。

学术史意识。这指研究者须充分考量同一论题在研究史上的“前人研究”,硕博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即是要求申请人做此项工作。这

① 顾颉刚:《我与〈古史辨〉》,第10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② 胡适:《胡适文存》,第277-278页,合肥:黄山书社,1996。

③ 彭玉平:《倦月楼论话》,《古典文学知识》2017年第1期。

当然非常必要。即以当代作家研究为例,其成名作家的研究普遍丰富,譬如,在2026年2月11日的“中国知网”上,检索“余华”二字可得论文1921篇,检索“莫言”二字可得论文3382篇,即便是去世二三十年之久的路遥、王小波,也分别可检索到论文1158篇、534篇。显然,这些已有研究文献是研究者不可绕过的阅读对象。当然,今日学者拥有的研究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不可想象:一两千篇论文,在知网上一键即得,两秒钟内尽在眼前,而在以前,没有数据库,学者往往都长期做抄录卡片的“笨工夫”。然而,即便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仍有不少学者疏忽此层。尤其初入学术的年轻人,往往一有想法,就立刻有挥洒万言之念。所以如此,一则与不少评论文章不做研究史追溯有关,二则年少气盛,觉得别人研究都难以入眼,不过“插标卖首”而已。但这其间多有误解,实则优秀评论家长期跟踪研究对象,对研究前沿虽未必显诸文字,但学术史意识并不缺乏。至于大范围轻看他人研究(尤其非权威学者之研究),本身即非审慎、严肃的研究态度。其实,在起意研究之前,必须细读有代表性的前人研究,考量自己的一二发现与心得是否已经为前人所述及。人之已见已言者,大可不必再重复。梁启超正是在此意义上,大力称赞王国维:

(静安)每治一业,恒以极忠实极敬慎之态度行之,有丝毫不自信,则不以著诸竹帛;有一语为前人所尝道者,辄弃去,惧蹈剿说之嫌以自点污。盖其治学之道术所蕴蓄者如是,故以治任何专门之业,无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尝不深造而致其极也。<sup>①</sup>

应该说,王国维这种治学态度,朴实,虔敬,但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当然与文学研究重在文本阐释而非史实考订有关。不过,年轻求学者若愿借鉴王国维之一二,于自己研究必大有裨益。譬如,在《白鹿原》出版已30年、问题几乎已穷尽的情况下,研究又该如何展开?这种情形,会对研究者形成“倒逼”,迫使研究者重返作家当年写作的情境,去读他读过

的书,譬如《陕西省土地改革资料汇编》《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以及他自己参与编写的村史《灞河怒潮》。这些材料读着读着,问题就不召自至:因为《白鹿原》呈现的“民族的秘史”,与这些民国史料几乎背道而驰,于是,“制造白鹿原”的问题就自然凸显,八十年代话语实践也会变得疑窦丛生。

可以说,重视前人研究并力图不重复“前人所尝道者”,是求学者学术史意识的突出表现。这种意识表现于著述中,即是引自前人研究的注释显著增多。当然,也有当代研究者不以注释为然,甚至鄙之为“学术八股”,但在古代文学研究者看来,这或是未入学术门径的表现:“若一篇论文注释文献皆为原典,则是对学术史之漠视(除此研究对象确无人关注外)。不知学术史,则创新云云实亦不知从何说起。若故意遮蔽学术史,则其学品亦似有亏。”<sup>②</sup>故审慎的当代文学研究往往注释较多。当然,这也引出一个技术难点,即如何处理自己持异议的前人观点(尤其名家观点)?如果如实引出并依据新的材料予以驳倒,虽自认不过是例常的学术商榷,但却可能被误认为哗众取宠,或遭到名家弟子和粉丝的激烈反弹,引起非学术的纷扰。然而,因此不敢表示异议,也有违学术之本义。在此方面,彭玉平教授的做法很可参考:“若人之所言精粹者,行文宜揭出其名,以为标榜;若人之所言舛误甚多,则或直接忽略,或于注释中引其篇目,他人或不察尔用心,当事者必览而知其所失,故待其自行修正可也。昔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引而伸之,此亦作文之恕道者乎?盖人非圣贤,孰能无过?”<sup>③</sup>当然,如此处理是就不展开辩论而言。若确实需要辩论,也亦以不揭出其名而准确概括其观点为宜。

深解“前人所尝道者”,才能有“照着讲”“接着讲”“反着讲”“自己讲”之基础与可能。“照着讲”“接着讲”是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里

① 梁启超:《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陈平原、王凤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8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②③ 彭玉平:《倦月楼论话》,《古典文学知识》2017年第1期。

阐述的一对方法概念,其中,“‘照着讲’要忠实于传统哲学的‘本来意义’,并用现代语言将其写出来(或说出来)”,“接着讲”则是哲学创新的方法,要“着眼于哲学的发展和新的创造,是有明显的时代性的,而时代性就意味着新的东西的产生”。<sup>①</sup>不过当代文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不同,“照着讲”意义不大,无论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研究,都更强调“接着讲”“反着讲”乃至“自己讲”。其中,“接着讲”“反着讲”都直接是对“前人所尝道者”的补充、发展或辩驳,至于“自己讲”,则是要求研究者能提出自己的方法系统甚至自主知识体系,但所谓“自主”,多半源于研究者在已有体系内部发起的“反戈一击”。因此,“接着讲”“反着讲”与“自己讲”都建基于深厚的学术史意识,包含对前人研究的理解与对话。而有此意识的学者,也深知自己也会成为“前人”,也会经受后来者质疑。既如此,成熟的学者都会特别磨砺自己的材料与论述。

以上“惧蹈剿说之嫌”以及寻求研究对象“前后左右的关系”,是当代文学研究需要慎重考量的学术史意识与文学史意识。如此“双史”意识,连同材料功夫、“小题大做”的方法以及对自我“历史记忆点”的确认,都是治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难说有何高见,不过在近三十年的学习探索中,在对前代与同代学者的见贤思齐

中,的确有二三感触,也有切实的收益,于是拉杂谈来,希望能对有志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年轻人略有参考之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改革开放40年小说本事资料的发掘、整理与综合研究”(21AZW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代表作有《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张爱玲十五讲》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七十余篇。曾入选2017年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曾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奖等学术奖项。

① 蒙培元:《如何解读冯友兰的“接着讲”》,《中州学刊》2003年第4期。